

深一度

浙江新闻名专栏

首个将总部落户宁波的全国性科技风投——唐鸿国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斥资亿元专注于智慧产业成果推广和投资。落户至今短短数月，这位科技范儿十足的“资本极客”，已经在风投林立的宁波资本市场刮起了一股“智慧旋风”

唐风来袭 旋动智慧产业

本报记者 余晓辰 通讯员 秦羽 屠炯

“超级联姻”催生全新风投模式

金秋十月，宁波科技和风投界迎来收获的季节。日前，我市3315项目与资本市场最大规模的合作在高新区落地。唐鸿国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唐鸿资本”）联手宁波华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华自科技”）与宁波东方之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东方之光”）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唐鸿国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由智慧产业投资经验丰富且独具行业视野的民营企业家打造，于今年6月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正式落户宁波国家高新区，成为首个落户宁波的全国性科技风投总部。

东方之光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落户宁波重点资助的3315团队项目，公司以光学计数探测、光电成像为技术基础，开拓军品民用的市场，其产品在航空航天、消防、船舶、电力、石化、环保等行业具有广泛的市场空间。

为拓展东方之光技术成果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唐鸿资本联手拥有丰富的石化行业智能化项目运作经验的华自科技，共同为其提供行业资源、市场策划、商业管理模式及全部试点投放费用。

“项目计划在一年内斥资数千万元，避开行业应用的立项、招标等门槛，将东方之光的技术和产品全部免费提供给典型行业试用，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在石化、消防、电力、环保等行业形成若干个典型案例，继而实现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的目标。”项目负责人介绍，在此基础上，合作将逐步推广到整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成果民用市场拓展上。

此次超级联姻，标志着我市在科技投资领域实现了从单一资本介入到行业资源、市场运作、商业模式创新及资本投资等“全方位”助推技术成果产业化的飞跃。

宁波帮“科技极客”情归故里

乡情浓浓，百鸟归林。在唐鸿资本体系里，



无论是院士、专家组成的“极客团”，还是专业的投资人，大部分是地地道道的老宁波。在他们心中，充满了助力家乡智慧产业与国内外前沿的行业领袖、技术成果、商业运作、资本市场对接的热情。

“受到宁波帮大会的感召，我们约请了宁波市中国工程院知名科学家倪光南院士助力，和一批具有行业视野的宁波民营企业家一起立足家乡，建立全国科技投资运行总部，参与家乡的智慧城市建设。可以说，唐鸿资本就是宁波‘回归经济’的产物。”唐鸿资本首席执行长龚耀军感慨，“宁波帮的‘回归风’吹来了不少科技大牛，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出任唐鸿资本首席科学家，并建立‘倪光南工作室’，今后唐鸿资本还将继续引进大批院士、行业领袖的助力，促进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

曾担任工信部国家物联网产业研究院首任院长的唐鸿资本首席执行长龚耀军，这次带领一支具有海内外技术背景和实际操作经验的博士团队和原国家物联网产业研究院部分主力，全面操盘唐鸿资本的日常运营。龚耀军和他的团队倡立的国家级物联网技术应用推广平台，以商业模式创新促进技术成果最广泛运用，获得了工信部、地方政府、行业院士等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2012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亲临视察，龚耀军本人因此入选《物联网与云计算》杂志封面人物。

唐鸿资本将在我市建设智慧城市的良好基础上，积极拓展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国家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中科院计算所、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等顶级行业合作渠道，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合作空间，立足两化深度融合，在技术应用、推广、投资等领域，实现先进技术资源、成果、产

业、市场、资本的密切结合。

“智慧产业”民间引导资金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品、应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奇幻漂流”。截至目前，我市高新区已集聚PE、VC、天使投资等各类金融机构100余家，资金规模超过70亿元，形成优质科技和金融资源的聚集效应，为漂流安上了强劲的“发动机”。

“唐鸿”定位是科技投资领域的“引导资金”。对项目的投资不仅仅是资本的介入，更在于信息、技术、渠道、市场、品牌、人才、商业运行策划等全方位的介入，对投资项目具有更大的发展支撑，将大大提升投资项目的产业化进程及在资本市场的估值，也给资本市场提供了优质项目的跟投机会。”龚耀军介绍，唐鸿资本专注于智慧产业技术和成果应用投资，最大限度实现成果从产品化到商品化的转化。

“宁波民间资本市场对战略新兴产业尚处于‘有热情但摸不着门路’的状态，而专业性科技‘引导资本’的出现，恰能起到有效引导作用。唐鸿资本将全国的运行总部落户宁波，运营短短数月，已经体现出其行业定位、资源整合、团队运营等方面的优势。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唐鸿’能在宁波扎根，为技术和市场牵线，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市经信委（智慧办）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据悉，唐鸿资本拥有一批包括院士、博士在内的具有智慧产业技术背景的项目评估和遴选团队，与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国内外顶尖行业机构、行业领袖、资本市场等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明确定位为智慧产业的“引导资金”。据估算，唐鸿资本的“引导资金”效应将撬动资本市场10倍以上“跟投资”的跟进。

此外，唐鸿资本倡导的“免费商业理论”，通过产业链利益的多渠道整合和全新分配，免费提供给最终用户使用的模式，有效避开案例实施过程中立项、招标、筹资等制约因素，能够迅速实现技术成果的大规模应用和推广模式，将大大拓展技术成果的应用市场空间，给新兴技术商品化提供了全新的操作手法。

延伸阅读



“免费商业理论”孕育行业典型案例

基础研究与市场应用之间的鸿沟，被称为科技成果应用与转化的“死亡之谷”。据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化不足5%。因此，各级政府的科技基金及资本市场越来越关注具有实际应用案例的成果转化项目。

新技术成果的推广很大程度上受到应用单位的立项、招标、资金筹措等繁复程序和因素的制约，具有很大的时间及程序的不确定性。

唐鸿资本推出全新的“免费商业理论”，计划在一年内提供5000万元的案例布局经费，全部免费提供给具有典型行业推广价值的技术成果和行业用户使用，以期完成8至10个典型行业试用案例。它避开了立项、招标、资金筹措等门槛的制约，给典型行业内的大面积推广提供可以信赖的依据，大大加快成果转化市场化进程。

按此模式，唐鸿资本已经与我国核工业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宁波“中物科技园”落户的宁波东方之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由唐鸿资本提供行业资源、市场策划、商业管理模式及全部试点投放费用，助推东方之光先进的军用技术在石化、消防、电力、环保等典型行业形成若干个试用案例。（余晓辰 秦羽 屠炯）



做好淘汰落后产能的“减法”

□范 劲

杭州湾新区为追求绿色发展，重拳出击整治高污染企业，投入15亿元清理39家漂染企业。这些企业的能耗占到整个新区的15%，产出却只有1%，不仅严重污染环境，也不符合新区发展的长远规划，将在年内全部关停。（10月15日《宁波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几次讲话中指出，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是一种不同以往、相对稳定的状态，一种趋势性的、不可逆转的状态。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速，不再唯GDP论英雄。而是确立“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理念，并将其作为推进今后发展的主要价值取向，决策时优先考虑生态

保护，调整经济结构时优先发展清洁行业，新上投资项目时优先进行环保评估。生态文明反映人类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杭州湾新区当初打造漂染园区，并存在八年之久，应该说是走过的一段弯路，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今后发展的警鉴：不要再去走一遍。

按照“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要求，采取自主退出、原地转产、异地重组等方式，关停并转落后产能，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抉择。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情，取得共识极其重要，不仅对新区管理者来说是这样，对企业家来说更是如此。绿色发展理应成为企业自觉追求的目标。既然是落后的

（高污染高能耗），选择退出就是为了遵循和捍卫具有更高价值的规则。双源印染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琚国荣坦言：“其实这几年我一直不安心，染色行业退出也是造福子孙后代。”具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希望这些企业能够浴火重生，走出一片新天地。

杭州湾新区的领导认为：“现在引进的项目起码要15年不落后，使我们的产业发展有生命力。”此言意味深长。我想，干部的一届任期是5年，但就责任而言，那就是说要对15年负责。他是说“起码”，是留有余地的，那就是说要对更为长远的发展负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央看一个地方工作做得怎么样，不会仅仅看生产总值增长率，而是要看全面工作，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以此论之，要优化产业结构，就难免需要适当减速，但解决了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实现了绿色发展，这就是成绩，并且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杭州湾新区起步之初，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想发展得快一些，想早些多铺些摊子在上面，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发展规律告诉我们，要谨慎地接近繁荣，以绿色引领发展。不能为了某个荣耀的数字，某种所谓“政绩”，去任意挥霍生态资源，做出贻害无穷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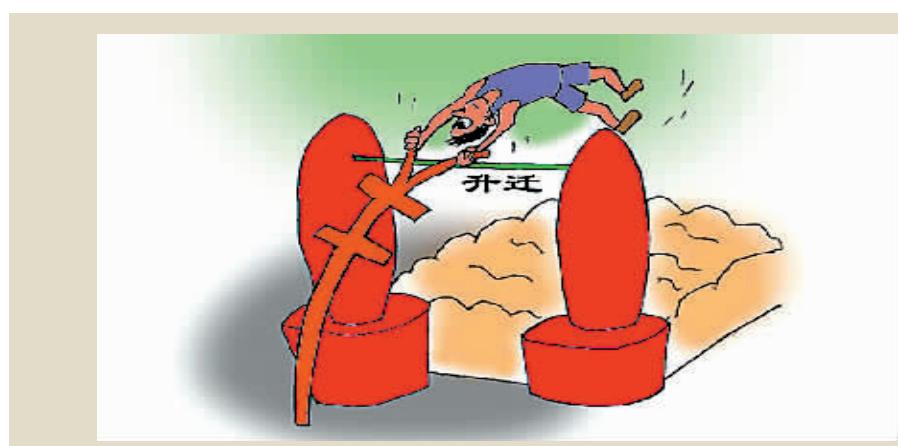
“最牛车补”何以“逆势而上”

□钱夙伟

深圳国企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最近实行的车改方案：总经理每月6800元，副总经理每月4800元，部门正职与副职每月补贴分别为3600元、3200元。有员工发帖说，已经远远超出7月出台公布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补贴标准，堪称“最牛车补”（10月16日《南方都市报》）。

“最牛车补”其实早就有。比如，此前有媒体报道，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区委书记、区长车补达7.6万元，弓长岭区区委书记和区长车补8万元，如果不是一天到晚在“车轮子”上办公，何以要那么多车补？显然，如此车补，并不完全是公共交通费用的性质，而成了按照级别发放的福利。

不必讳言，“车改”在不少地方和单位，已经成了权力自肥的遮丑布。本来，公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地位、待遇与公车的使用脱钩，然而现在，公车改革俨然成了官员权力自肥的另一个契机，通过“车改”，名正言顺地给自己发放“最牛车补”，反而强化了以地位、待遇为标志的特权。



撑杆跳

陈英远 绘

“反腐不掉队”是好声音

□易其洋

山西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被查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倡廉密锣密鼓、疾风暴雨，连“老虎”都打倒不少的情况下，这个级别的贪官落马，是没有多少“轰动效应”的。但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10月11日丰立祥还在主持传达中央、省委反腐工作的会议上表示，“在反腐败方面不能掉队、不能落后”（10月16日新华网）。

按理说，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各级部门和单位，一般设有纪委或纪检部门，配合中央行动，“拍蝇

打虎”应该形成上下联动、合力推进之势。事实却是，中央反腐“热火朝天”、步步为营，中纪委、中央巡视组连连揪出“老虎”、拍落“苍蝇”，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肃贪反腐却是“悄无声息”、“一无所获”。

之所以如此，并非自家“一亩三分地”里真没有贪腐之徒，而是缺乏反腐的自觉性和内在动力。听说过要“发展经济不掉队”的，那是因为光彩，是可资升迁的政绩；而说“反腐不掉队”，人家查出两

严控会议费支出是反腐重要议题，地方政府在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大多作出了“限星”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更是明确：“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含四星级）定点饭店召开。”由此产生的一个怪现象是，在全国多地，部分五星级酒店放弃星级资质的复审，从“五星”变“无星”。今年初以来，我国“弃星”的10家五星级酒店中，至少半数为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10月16日《新京报》）。

酒店的功能决定着市场方向和客源群，星级则决定着酒店的客源层次。如果是一家面向市场的酒店，当然希望获得更高的评级以赢得更优质客源及更大利润。因此，从市场竞争角度看，五星级酒店放弃星级资质很不正常，这从侧面证明，其服务对象不是市场客源而是政府机关。

高端白酒、高端汽车乃至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强力反腐而出现困境，五星级酒店自然也不会例外。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坦言，“限星”政策对酒店打击很大。这些从“五星”变“无星”的酒店，并非不再爱“星”，而不过是通过这样的“下有对策”，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使之“符合规定”。事实上，这些五星级酒店在“弃星”后，价格并未随之下调。即使“无星”了，会议室单日使用费依旧远超其他没有定点身份的五星级酒店。

五星级酒店只要放弃星级，就能继续得到政府订单，当然非常合算，“五星”或“无星”并不重要。问题是，相关政府机关难道也只看星级，不看价格吗？在“弃星”的五星级酒店店里开会，是对“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阳奉阴违，这和“矿泉水装茅台”、“农家乐里洗桑拿”是一个腐败路子。不正常“弃星”的五星级酒店，在为谁换马甲，有必要顺藤摸瓜严肃查处。

有专家认为，各地在严控会议费的管理办法中，均有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人均住宿标准等限制条件，是否选择星级酒店和会议费的标准没有正相关的联系。殊不知，会议费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虚报消费人数和住宿时间“做假发票”，更是司空见惯——只要达到看得见的“限星”硬标准，花再多的钱在面对酒店星级的管控有效，所以“降星不降价”的酒店“弃星”，才会有利可图。

五星级酒店为迎合政府需求而“弃星”，说明其政府性的业务量仍然很大。由此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严管之下仍有那么多的会议？对照“八项规定”，“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是否还在大量地开？如果文山会海的工作作风真正改变，五星级酒店还会为得到政府订单不惜放弃星级吗？反过来，如果会议繁多的问题不解决，“限星”之类的控制标准又能有什么作用？

五星级酒店“弃星”是为谁换马甲

□盛翔